

郭茂倩题銘与赵子游墓志 ——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陈瑞赞

内容摘要:《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銘，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

关键词:郭茂倩 题銘 仕履 赵子游 墓志

2015年7月，在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学士前村鲤鱼山麓建筑工地出土一方碑刻。碑石高87厘米，宽56厘米，厚8厘米。两面都刻有内容：一面是线刻观音海神像，并有元符二年（1099）永嘉知县郭茂倩的题銘；另一面刻墓志一通，志主赵子游。碑刻原置于赵子游墓中，现藏温州博物馆。墓在施工过程中遭毁，碑面留有铲车铲划的痕迹，所幸线刻像和墓志的内容均未受损坏。

郭茂倩是《乐府诗集》的编者。赵子游是宋宗室，南宋初年曾知南外宗正事，《宋史》卷二四四有传。碑刻的出土，对于了解这两位宋代名人的生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有关郭茂倩的仕履

《乐府诗集》是中国古代乐府歌辞的总集，也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文学的重要文献。遗憾的是，《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的生平却湮没难考。陈振孙在他的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里叙述的郭茂倩家世已出现错误，而于郭茂倩的生平，则云“未详其官位所至”^①。陈振孙生活于南宋后期，上距郭茂倩不过一个

^①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郭茂倩为郭源明之子，而陈振孙误作郭源中之子。辨见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转下页）

半世纪左右。可见,郭茂倩的事迹并未随着《乐府诗集》的流传而广为人知。

郭茂倩,字德粲,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①。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郭劝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累赠礼部尚书;父郭源明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知单州。据苏颂所撰《职方员外郎郭君墓志铭》,郭源明有五子,长子茂倩,“河南府法曹参军”^②。郭源明卒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墓志铭》亦当撰于此时。可以肯定,郭茂倩在元丰七年之前已仕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郭茂倩仕履的唯一记载。而线刻观音海神像碑题衔的发现,则为郭茂倩的仕履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观音海神像碑原立于蒙泉(在今温州市区华盖山麓),构图如下:居中为白衣观音,头顶佛光,脚踏云头,其造型与国家图书馆藏宣和六年(1124)江阴县寿圣院泛海灵威观音像^③颇为相似。在观音右侧下方有一人,从波涛中踊出,面向观音,双手捧盘,盘中一物,形如圆珠,大概是向观音献宝的海神。两宋时期,温州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以观音海神像刻碑,应与祈求航路平安,海商繁荣有关。就在与华盖山相连的海坛山上,有一座海神庙,相传建于唐咸通二年(861),为历来祭祀海神之所^④。如果将海神庙联系起来看,蒙泉观音海神像的功能就更加明确了。

郭茂倩题衔在观音像左侧,共两行三十一字:“元符二年九月十五日立石于蒙泉(第一行),通直郎、知温州永嘉县事、赐绯鱼袋郭茂倩(第二行)。”

按,宋代仕途有选人与京朝官的区别。选人亦称“幕职州县官”,“幕职”指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属官,如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州县官”包括京府、留守的属官,州、府的属官,以及县级的知令、主簿、县尉等。初入仕者为选人,只有改为京官,才能得到升迁为中高级官员的机会。“改官”是宋代仕途极为关键的一步,“改官”的条件也颇为严苛,除了任数和考限的要求外,还需要取得五位举主的荐状。所以,宋代很多人终身都沉沦“选海”而不得脱身。

(接上页)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①历代书志著录《乐府诗集》,或署编者为“太原郭茂倩”,乃指郭氏郡望而言,已经前人辨明。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6页。

②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9页。

③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④参见宋元丰三年(1080)温州通判赵帆所撰《海神庙碑》,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北宋有四京府，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郭茂倩元丰七年前担任“河南府法曹参军”，其身份是选人，属于“州县官”中的京府属官一类。至元符二年（1099），郭茂倩的职事虽然是“知温州永嘉县事”，但他的寄禄官为“通直郎”，表明他已由选人改为京官。在元丰改定官制之后，诸州县令为正九品，而通直郎则为京官正八品，阶在宣德郎、宣义郎（从八品），承事郎、承奉郎（正九品），承务郎（从九品）之上^①。宋代官员以“官”（寄禄官）定品，所以郭茂倩是以正八品的京官差遣为知永嘉县事。

宋代选人分为“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四等。“判司簿尉”是四等中最低一等，不能直接改京官，必须先迁“令录”或“初等职官”，然后“自职、令荐书合格，皆改京官”^②。河南府法曹参军属于“判司簿尉”，按照通例，郭茂倩改官之前也得经历“职、令”的阶段，这一过程恐怕不会太短。郭茂倩由选人改京官，在元丰七年之后，元符二年之前，可能更接近元符二年，但究竟在哪一年，尚难确定。

宋代服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③。服紫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④。常制之外，则有赐服，主要是依据年劳，特许低品级官员着用高品级服色及鱼袋。赐服对象，初为朝官，后扩及京官与选人，年劳亦由二十年缩短为十五年^⑤。从元丰七年至元符二年，郭茂倩前后服官已达十六年，假设元丰七年并非郭茂倩的初入仕之年，则他服官时间很有可能在二十年以上，完全符合以年劳获赐五品服色及鱼袋的条件。

比起许多终身未能改官的选人，郭茂倩可谓幸运。但沉浮仕途一二十年之久，仅得以正八品京官差遣为知县，亦可见宋代官员升用之艰难。现有史料未发现郭茂倩的科第信息，郭茂倩很可能是以父、祖恩荫进入仕途的，属于无出身的“荫补人”。郭茂倩升迁速度的迟缓，与其“荫补人”的身份或许不无关系。

郭茂倩任永嘉知县，不见于文献记载。现存《温州府志》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及清康熙、乾隆等不同时期的纂修本，《永嘉县志》有明嘉靖及清康熙、乾隆、光绪等不同时期的纂修本，都没有郭茂倩任永嘉知县的记录。以记载最为

①俞宗宪从宋孙逢吉《职官分纪》中辑出相关资料，制成“元祐官品令官品表”（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附表，《文史》第21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120页），大致可以代表元丰改制后之官品制度。本文诸州县令、通直郎的官品，即参考俞文。

②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6页。

③《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4051页。

④《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五》，第3568页。

⑤关于宋代赐服的情况，参考陈文龙《论唐宋时期的“赐绯紫”》，《北大史学》第1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6页。

详备的[光绪]《永嘉县志》为例,该《志》卷九职官表宋代知县题名于绍圣四年(1097)陈完之后即接以崇宁二年(1103)赦知言^①。但如果说陈完从绍圣四年到崇宁二年一直在永嘉知县任上,实在有点反常。所以,[光绪]《永嘉县志》的宋代知县题名显然并不完整,而郭茂倩应当就属于漏载之例。

二、赵子游墓志

赵子游墓志,无篆盖。十七行,满行二十五字。全文共计三百五十五字,兹录于下:

宋故右奉直大夫、直敷文阁、知南外宗正事、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紫金鱼袋赵子游,艺祖皇帝五世孙。曾祖考从信,保宁军节度使、楚国安僖公;曾祖妣富春郡夫人孙氏。祖考世逢,少师、舒国益公;祖妣吴国夫人张氏。考令麌,太师、安定襄靖郡王;妣秦国夫人王氏、魏国夫人王氏,继母越国太夫人王氏,所生母吴氏法诚。

崇宁五年三月举进士第,授三班奉职。后十年,奉御笔以尝为南省榜首,易置文阶。筮仕五十五年,自筦库至郡守、监司、连帅、宗官,凡十九任,不以毫发墨吏议。

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以疾终于官所,享年七十有九。娶恭人宋氏,孝章皇后之裔也,先十年卒。男十人:伯禾、伯采、伯棐、伯棠、伯果、伯果、伯棗、伯窠、伯乘、伯柬;果早亡。女三人,长适李造道,次适郭康辅,次适孙友龙。孙男三十人,孙女三十一人。曾孙男三人,曾孙女五人。以隆兴元年正月十八日葬于温州永嘉县建牙乡净名院后山之阳,从先塋也。其行已效官,具载行状。

右埋铭,先公亲笔,今移刻于石,系以岁月。伯禾等泣血谨书。

据赵伯禾的题识,墓志系据赵子游生前亲笔所撰,补充卒葬岁月而成。自撰墓志始于晋代陶渊明,在唐宋时期虽有一定发展,仍然比较罕见^②。赵子游自撰墓志,为研究宋代墓志类例增添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墓志文颇简略,下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世系。赵子游为宋太祖太子德昭之后。德昭生惟忠,惟忠生从信,

①王棻、戴咸弼等纂,王志邦等标点:[光绪]《永嘉县志》,中华书局,2010年,第363页。

②据研究者统计,现存唐人自撰墓志8方,宋人自撰墓志18方。参见黄震:《略论唐人自撰墓志》,《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第163—167页;仝相卿:《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64—72页。以上统计数字未必准确无误,但在数以万计的唐宋墓志中,自撰墓志数量之少,是可以肯定的。

生世逢，世逢生令麌，令麌生子游。墓志叙从信至子游世系，与《宋史》所载吻合^①。墓志称子游为太祖五世孙，是从惟忠开始计算的。惟忠为太祖之孙，惟忠子从信为二世孙，以下类推，至子游恰为五世孙。以曾孙为“二世孙”，这种计算世次的方法与我们今天的习惯不同，值得注意。

二、居地。赵子游卒后葬“温州永嘉县建牙乡净名院后山”，这一墓地在墓志中被称为“先塋”，所以应该还葬有子游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既然祖墓在永嘉，那么赵氏也应该定居于永嘉。《宋史·赵令麌传》曰：“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于泰州，命令麌知西外宗正事，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挈宗子避地福州，因置司焉。”^②赵令麌南渡后最早居住在福州。据此分析，赵家迁居永嘉有三种可能：一是赵令麌南渡后自居福州，而将其父母家属就近安置于永嘉；二是赵令麌携家眷同居福州宗正官署，而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迁居永嘉；三是到赵子游时才移居永嘉，同时将其先人卜葬或移葬于永嘉。

三、科第仕履。《宋史》于赵令麌之后附载子游传，曰：“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户部侍郎王侯荐，加直秘阁。会建宁节度使士勣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请择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③并未涉及赵子游科第，所记仕履，亦仅限于湖北提刑、直秘阁、南外宗正三事。根据墓志可以补充部分事实：崇宁五年（1106），赵子游以第一名武科登第。初授三班奉职，政和六年（1116）奉旨改文阶。赵子游的仕宦生涯长达五十五年，从“卒于官所”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上推，他初授三班奉职当在大观二年（1108）。墓志谓赵子游“自筦库至郡守、监司、连帅、宗官”，共历十九任，虽然无法一一考实，但结合现有史料，还能得到一个大概。今将赵子游仕履制为一表：

序号	任官状况	时间	出处
1	三班奉职	大观二年（1108）	墓志
2	改文阶，官职不详	政和六年（1116）	墓志
3	川陕提举茶马司 干当公事	宣和四年（112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二
4	宁陵知县	靖康元年（1126） 前后	李光《庄简集》卷八《论行宫冒赏札子》、许翰《襄陵集》卷一《范秘赵子游转官制》、佚名《靖康要录》卷五

①《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一》，第8682页。

②《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一》，第8682页。

③《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一》，第8682—8683页。

(续表)

序号	任官状况	时间	出处
5	右朝请大夫、权发遣抚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	绍兴十二年(1142)	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八《大宋台州临海县佛窟山昌国禅院新开涂田记》
6	徽州知州	绍兴二十年(1150) 三月二十八日到任， 二十二年(1152)四 月二十四日受代	淳熙《新安志》卷九、弘治《徽州府志》卷四
7	右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点刑狱	绍兴二十七年 (1157)三月之前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七六
8	直秘阁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 十九日	同上
9	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	绍兴三十一年 (1161)二月之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
10	右奉直大夫、直敷文阁、知南外宗正事	绍兴三十一年二月 二十一日	墓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四〇

傅璇琮、龚延明、祖慧著《宋登科记考》，未载赵子游科第信息，墓志可补其阙。李之亮著《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据《泰州志》谓赵子游于宣和三年知泰州^①。经检崇祯《泰州志》卷四“官师志”、道光《泰州志》卷一三“秩官表”，宣和三年知州为赵子漪，而非赵子游。李之亮显然是因“漪”和“游”字形相近而产生了讹误。

三、几个问题

以上是对碑刻内容的介绍和分析，此外尚有几个问题需要略加说明。

问题一，碑刻中的郭茂倩是否即为《乐府诗集》的编者？考虑到同姓名的可能，对此实有进一步确认的必要。首先，从生活年代看，碑刻中的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完全对得上。其次，宋人所编《天台续集》收有郭茂倩的一首《石桥》诗：

石桥庵下少徘徊，雪暗松林拨不开。坐久无人天向午，双鸟飞上施生台。^②

^①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第149页。

^②林思葳等编：《天台续集》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9页。

《宋诗纪事补遗》与《全宋诗》皆据《天台续集》收录此诗，并认定系《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所作^①。郭茂倩在天台山的石桥留下题咏，说明他确曾来过浙江。这就为郭茂倩任永嘉知县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台州与温州相邻，郭茂倩在赴任永嘉或卸任北归的途中都有可能经过台州，游览天台山。所以，综合现有的资料，判定永嘉知县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为同一个人，是站得住脚的。

问题二，郭茂倩为什么要将观音海神像碑立在蒙泉？蒙泉是温州的一处名胜，在今市区华盖山西麓，旧永嘉县治（今为温州军分区大院）东侧。华盖山有容成洞，相传为黄帝时仙人容成子修道上升处，被道书列为“三十六洞天”之一^②。但观音并非道教神灵，在蒙泉置立观音像，与蒙泉的道教背景应无直接关系。前面提到，蒙泉与海坛山的海神庙位置相近，很多地方都有井泉通海的传说，是否蒙泉在宋代也被认为与海洋相通？如果蒙泉被认为与海洋相通，那么在此立观音海神像祭祷各种海上活动的平安，就容易理解了。

问题三，为什么原立于蒙泉的观音海神像碑会从相距十几公里的赵子游墓室中被发掘出来？这大概是由于赵氏后人贪图方便，就地取材，把蒙泉的观音海神像碑抬回家去作了墓志石。无独有偶，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后，温州地区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

瑞安高世则墓有穹碑一通，吴中太湖石所砻，碑阴锯纹朗朗而欹。闻宣德间，永嘉黄少保淮葬父，锯其半为神道碑。锯且尽，高之裔孙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黄问故，曰：“恐后人复欲锯耳。”黄默然。^③

就像今天一些地方将旧碑当作洗衣板或铺路石一样，把旧碑移作他用，在石材不易获得的古代可能并不鲜见。黄氏后人连他人墓上的神道碑都敢盗锯，而以赵氏声势之煊赫，所取不过是蒙泉的无主碑刻，那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赵氏后人攘取公物的行为当然不足取，但正因为被封固在赵子游的墓室中，这块留有郭茂倩题铭的珍贵碑刻才得以保存至今，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作者简介】陈瑞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①陆心源撰，徐旭、李建国点校：《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四，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7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965—12966页。

②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罗争鸣：《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390页。

③文林：《琅琊漫抄》，《丛书集成初编》第2897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